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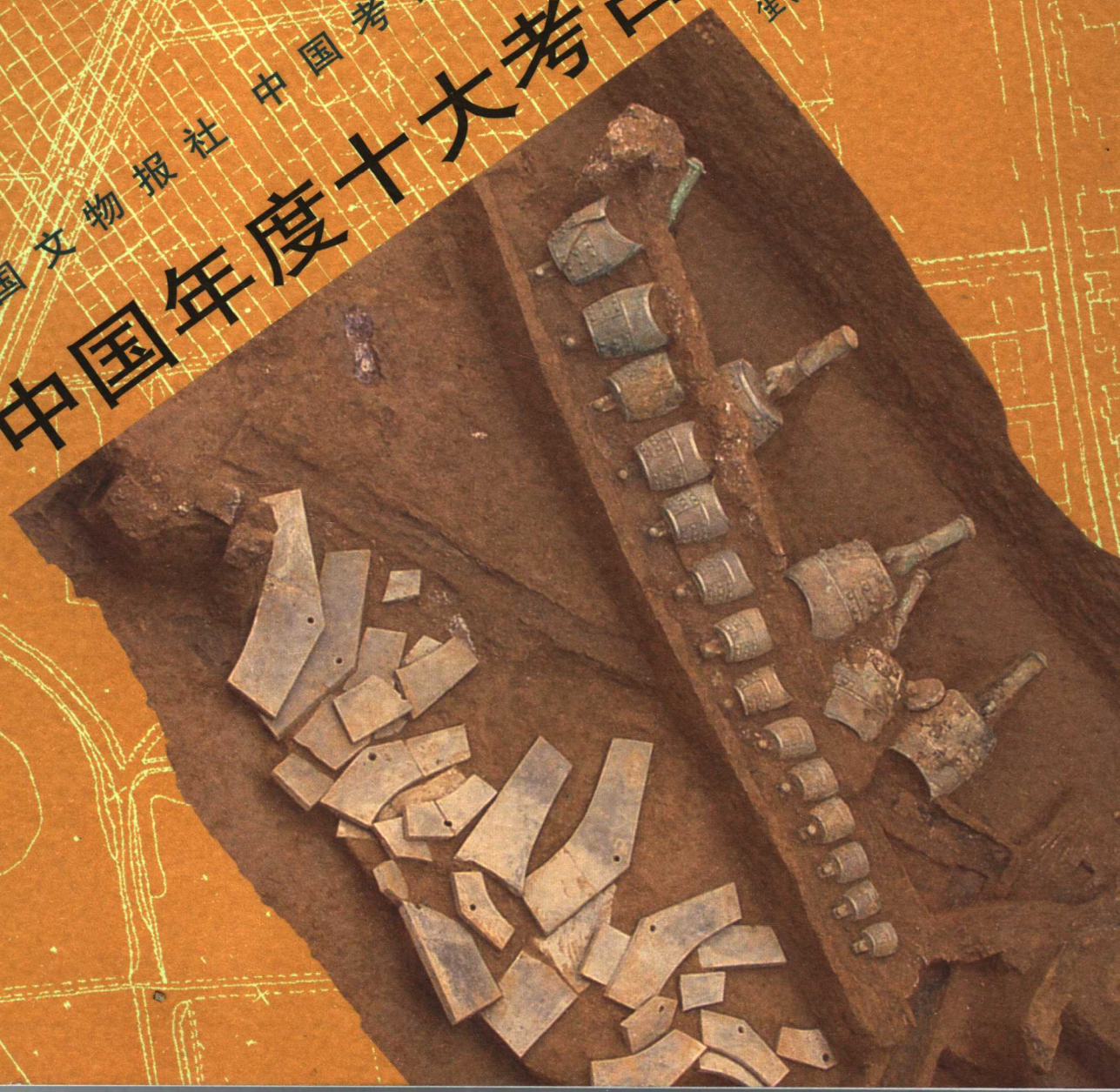
2000 年卷

新发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考古学会 编

中国年度十大考古



2000 年卷

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考古学会编



Copyright©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卷/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考古学会

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

ISBN 7-108-02261-3

I. 中... II. 中... III. 考古发现—中国—2000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4268 号

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0 年卷
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考古学会编

责任编辑：杜 非

装帧设计：宁成春 陈 嘉

电脑制作：1802 工作室

出版发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10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2.25

印 数：0,001 ~ 5,000 册

定 价：59.00 元

责任编辑：杜 非
装帧设计：宁成春 陈 嘉
电脑制作：1802 工作室

目 录

总序	徐苹芳	1
2000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布图		2
导言：考古发现与知识进步	曹兵武	5
福建旧石器考古的重大突破		
—— 万寿岩史前洞穴遗址	陈子文 李建军	13
解剖龙山时代城址的布局结构		
—— 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古城址	林留根 李虎仁	33
中原龙山第一城		
—— 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	蔡全法	55
岭南青铜时代		
—— 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	古运泉 吴海贵	83
楚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		
—— 湖北潜江龙湾遗址	陈耀钧 罗德胜	99

闹市地下的辉煌

-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 颜劲松 陈云洪 121

汉王陵内的交响乐

-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 崔大庸 137

发现最早的地坛遗存

- 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 贺云翱 155

南宋临安府治初露端倪

- 杭州临安府治遗址 杜正贤 169

历经半个世纪，汝窑窑址之谜破解

-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址 孙新民 181

总序

从199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2000年起参与)举行每个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这个活动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和考古学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2年曾汇集1990—1999年间的百项考古新发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自2000年开始,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则由三联书店按年度出版发行。

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标准有三项:

1.我们要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

2.考古新发现的内容评选标

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3.所谓新发现,是指这项考古发现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外,还要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信息和新的认识。

事实证明,通过每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可增强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以后考古发掘中的责任感,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性,端正学风,树立正气,又可唤起民众对保护文物的关怀和热情,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是一项考古学术研究和民众保护文物相结合的群众文化活动,其意义之重要,影响之深远,是显而易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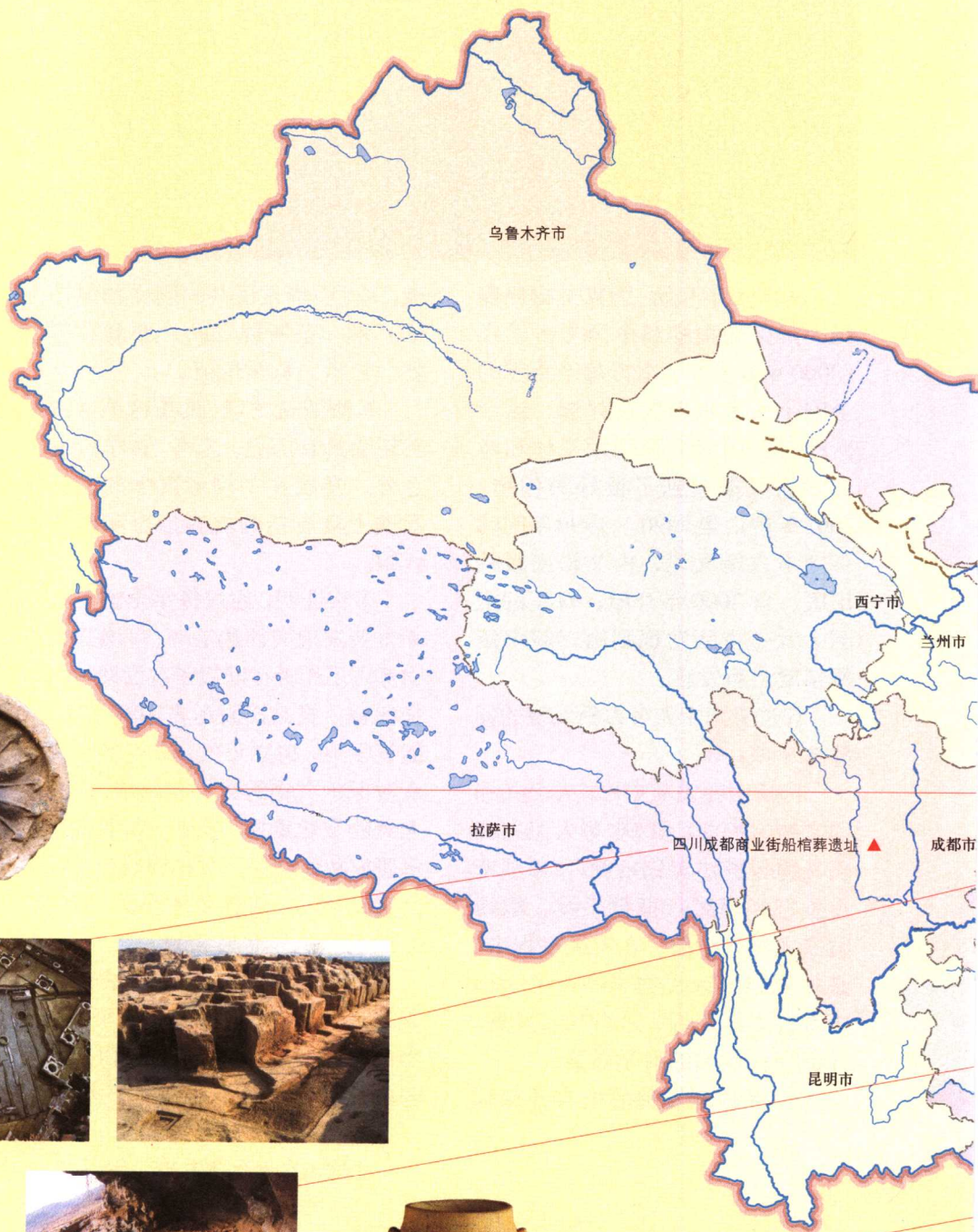
我衷心祝愿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在透明、公平、科学的原则下,在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支持下,顺利地开展下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徐苹芳

2004年1月于北京

2000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布图

二〇〇〇年
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布图



导言：考古发现与知识进步

17世纪,英国的阿谢尔大主教经过对《圣经》苦心孤诣的研究,终于推算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完成了创造人类的结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空前进步,人类希望了解自己来历的饥渴的心灵由此而获得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着落。在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英国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知识图景与历史模式:上帝在一周之内创造了人及其所生活的地球与动植物伙伴;后来,愚蠢的亚当和夏娃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诫说,触犯戒律,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类开始了生存竞争并遭受生老病死等生活的磨难;大洪水的降临是尘世苦难的一个巅峰,但是诺亚方舟拯救了善人诺亚及其子孙和若干人类的动植物伙伴,为人类继续生存留下一线希望;之后辉煌的希腊与罗马文明诞生,人类文化与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罪恶与美善以及毁灭与拯救的主题一直像一柄利剑高悬于人类的头顶;公元之时伟大的上帝之子耶稣

基督诞生,前来启示和拯救濒于毁灭的人类,历史在创造与摸索中前行。

上帝造人是西方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常识,因此,当欧洲人航行到达美洲、碰上印第安人时,他们起先是不愿意承认这些人也是人,后来虽然勉强承认了自己的这些人类同胞,却仍然倾向于将他们解释为10个失踪的以色列部落之一或者埃及太阳神后裔在遥远地方的传播和衍生。

然而,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人类对于自己的历史的认识。当欧洲人逐渐认识到所谓的上帝之作雷公斧实乃人类的作品,当伊文思等于1859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上正式承认法国索姆河畔和英国肯特郡洞穴中的人类遗骸、人工制作的石器和早已灭绝的动物骨骼共存的真实性的时候,当受神学约束较少的地质地层学的方法和成果被介绍到考古学中,使得人们相信人类遗存年代的古老性远远不是《圣经》的年代框架所能够容纳,而必须从科学的角度来探索和理解人类及其历史问题时,

上帝造人的神话破灭了。人被从上帝的神圣之手中解放出来，放置到坚实的大地上。自由的人、解放的思想被插上科技的翅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可以说，在进化论思想的产生和普及中，考古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9世纪末期，欧洲人已经将自己的文化传统绕过黑暗的中世纪，和一度十分辉煌的古代希腊与罗马相接通，并且通过考古学将历史的根源追踪到欧洲之外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尼罗河谷灿烂的早期文明。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也已经成为科学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虽然它们如何发展延续下来以及和后世的文明具有怎样的关系仍然不甚明了，但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以及由出土遗物缀连起来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表明的历史进化的漫长与连续，已经成为时人的共识。

20世纪20年代，欧洲、北美西南部、两河流域、埃及等地区的古代文化发展演替的粗糙的时间和空间框架已经被大致树立起来，比较激进的考古学家开始思考区域之间的古代文化的异同问题及其含义，进行区域之间的比较和交叉断代研究，甚至开始思考古代遗存的功能等问题，以及用其他手段探索人类早期文化发展的更细致的方面。从发掘与发现的角度来说，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20世纪二三十年

代构成了考古学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1922年，伍勒揭开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重镇乌尔的神圣面纱，而卡特打开了埃及国王图坦卡蒙之墓的大门。1924年，印度河谷发现了著名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明，达特在非洲发现了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祖先的南方古猿的头盖骨化石。1927年，马洛温发掘了古亚述帝国的都城尼尼微。中美和南美的古代文明中心也相继有不少新的发现，玛雅的成文历法为玛雅低地地区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绝对年代框架。而仰韶村、周口店和殷墟的先后发掘，逐步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起源问题探索的序幕。历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迅速延伸，世界几大古代文明的源头都开始有了一个粗犷的着落，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也已被追溯到数十万、上百万年前的遥远的非洲大陆和东亚南亚地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印度河谷、中美、南美的考古学时空体系也很快被确立起来，中国的考古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人类对古代的思考与关注范围扩大到古典文明以外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特别是历来很少受到重视的黑非洲因为达特和利基等人的卓越工作以及东非大峡谷和南部非洲在距今400万—100万年前左右古猿、早期人科与人属成员化石及相关遗迹等一系列重大发现，渐渐成为研究人类起源最重要的地区。20世纪六

七十年代以后,新的考古学思潮产生,古代人类的行为以及文化进化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受到关注,文明的起源与传播、农业与畜牧业这类关系到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发明以及人类起源及其向全球各地扩散的方式与动力等问题,成为人们新的关心和知识增长热点。

相对说来,中国考古学起步较晚,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科学的考古学在20世纪20年代由西方传入。1921年,时任中国地质矿产部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工作被认为是中国首次科学田野考古发掘,要比欧美晚半个世纪以上,比日本也晚了30年左右。其时埃及、两河、美洲等古代文明已有许多惊人的发现,古代文明体系的大体框架也已基本确立。而在考古学传入以后,更生图强中的中国又多灾多难,中国考古学以自己的祖国一起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4年国内战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其间小的风吹雨打更是不计其数,严重阻碍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中国考古学中有待于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实在很多。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连绵不绝、今仍硕果存世的国家,中国经历了人类起源、食物生产和文明起源以及文化演进的各个重要阶段;在文明社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又具有着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如果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文明史家汤因比最具概括性

的文明史观,中国文明无疑应该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最大的一个支系,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概括其为“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各类文物古迹不计其数。因此,从时空和内涵上来说,中国考古至少与整个欧洲或美洲的考古是等量齐观的。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系统地比较了世界各大古代文明体系后指出:中国考古是解读人类历史进步历程、认识文化发展规律、为一般社会科学贡献法则的最为理想和重要的试验场所之一。

中国考古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不能不使大家对考古的新进展抱着殷切的期望之情。英国著名考古史家丹尼尔在描述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考古学发现时,根据中国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断言中国考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丹尼尔说道:

“令人激动的不仅仅是这些发现十分丰富,而是基于它们提出了一种对中国史前史——从而也是对人类史前史的一种全新主张,即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中国是近东在遥远的东方所建立的边缘驻地的观点已经过时。现在无法否认中国的农业与青铜制造独立发展的事实。新的中国考古像美洲考古在前25年中的发展那样,已经

* 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使一元进化的学说成了陈词老调，而在1926—1950年间，这种论调曾经完全控制了当时考古学界的思想。”*

从中国考古内部观察，真正的黄金时代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经济起飞，为配合基本建设而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学术探索百家争鸣，国内外学术交流自由通畅，中国考古才算是达到了顶峰。这一阶段，中原内外接连爆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诸多史前城址、东北的牛河梁、东南的良渚、西南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与三星堆、南方的石家河和大洋洲等，这些新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几乎达到改写太史公司马迁以来就被传统观念所认可的中国文明体系框架的程度。举世瞩目的三大起源（指人类起源、生物生产起源和复杂社会的起源，它们不但成为考古学探索的前沿课题，同时也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推陈出新的试验场）探索方面，各地也不断有新的材料出现，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中国考古学也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建国以来与国际考古界最新进展的隔膜被逐渐凿破；考古学方法与理论逐步多元化；考古发掘的主体逐步基层化和分散化；同时由于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配合基本建设使得考古发掘工作

的数量急速增加，考古资料的积累呈现爆炸式膨胀。

然而，由于新的考古发现来得太多太快，连考古学家自己都有些目不暇接、穷于应付，认真的研究思考并没有跟上，许多考古项目甚至连考古发掘报告都来不及撰写和出版，加上缺乏适当的宣传和沟通渠道，发现的成果难以与人共享，甚或由于口耳相传，媒体炒作，引起不少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考古新发现的主要报道媒体和文博新闻传播机构的中国文物报社在彭卿云先生主政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一批考古学界的前辈大师的鼓励下，于1991年2月策划了首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从1990年度数以百计的考古发掘中评出10项学术价值显赫的重要发现，同时评出的还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后，这个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等主办，已经连续坚持了十余年，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中一道亮丽的景观和普及考古知识的一个重要窗口。每次评选结果揭晓以后，报道评论的媒体都在四五十家以上，其中很多是港台或者海外媒体，一些报刊甚至推出专刊特稿，足见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关注程度。

其实，考古学界以外热心于十大考古新发现，主要是出于对关于人类

自身知识的渴求和对中国考古学学科进步与学术成就的深切关注。人类总是对自己的历史存有特殊的兴趣。这是一个知识爆炸时代的典型现象。回想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确定远古人类存在的事实对人类整体知识体系的巨大冲击,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异曲同工。许多人已经明确地指出,只有通过研究自己的过去,人类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现在;通过认识我们的祖先的种种成就和过失,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的道路。德国著名考古学史家西拉姆说:“人类要想看清未来的100年,首先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英国著名的古物学家威利·卡姆登指出:研究古代遗物,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为高贵的食粮”。考古学就正是这样一门让人类回头去看自己过去5000年甚至更长历史的学科,它通过发掘、记录、整理、分析和解释人类在过去生活中留下的物质遗存,拼凑、复原和认识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文化与历史。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经说: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就是“了解人类的以往过程,寻找文化进步的本质,人类今后的前进方向”。

考古学作为一门回头看的学问,不断刷新人类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不是依靠书斋里的皓首穷经,而是依靠考古学家的手铲和田野发掘。可以说,每一次考古发掘或多或少都

会有新的发现,它或者是填补了人类某一方面的记忆 and 知识空白,或者是重复与验证了已有的发现和认识。

在很多人的眼里,考古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发现史。

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虽谓其“新”,其实当专家们坐下来品评的时候,发现其或属苦苦寻觅的结果,或是偶然的机缘,瞬间已成往事,评选活动不过是一次往事的重温,一种对发现的集体的面对,希望参透其中蕴含的玄机,是为了分享和普及发现的深层意义。

当然,考古的发现往往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像卡特发现图坦卡蒙陵墓、邹衡发现曲村晋国早期都城和晋侯墓地那样,经过长期钻研、深入考证、深思熟虑和艰苦寻索的发现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发现首先暴露于推土机下,甚至是盗墓贼的手下,考古学家只是做了善后工作般的“清理”。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发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这种抢救性清理的结果:有些是配合工程建设的抢救,有些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面临破坏的危险不得不进行发掘,还有些根本就是和盗墓贼抢时间比速度,看谁更快。我个人认为,这可称为是一门学术的悲哀了。但真正启迪人心的考古学史,是留给那些通过新的方法新的探索,刷新了考古学家的眼睛和耳朵、对考古学思想的深度与逻辑性以及人类的总

体知识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探索者而非挖宝者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推动考古学不断进步的是发现本身、考古学家做出发现的方法与姿态以及人们对待发现的态度这样几架马车——发现使古代进入我们的眼睛,方法与姿态使古代进入我们的思想,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为重要。错失了今天的发现,是把机会留给了后人,而方法上的局限和失误,将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和过错。

我们希望通过评选活动,通过经严格科学的程序被冠以“重大”二字之后,这些考古发现能够引起发现者、评选者、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的爱好者以及那些关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未来走向的公众等更多人的关注,希望评选活动能够在这些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发现来临之后,能够面对着“重大”二字沉静地思考和体味发现以外的东西:它的内涵,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对学术研究和人类认识自己的贡献以及对普及文物知识、提高文物保护意识的促进作用,让发现成为一座联系人类自身的历史以及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基本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每年的评选活动之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自不必说,这些发现及其遗址立即得到相关方面应有的注意,有些遗址很快被公布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临的破坏和

各种威胁得到遏制,科研条件得到改观,甚或在得到有效保护之后被合理地开发和展示出来,成为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等的重要驱动力。从这个角度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自然应当成为人们观察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工作新进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尺和窗口。

作为评选活动的主办者,我们希望评选活动更加公开、透明和公正,对考古新发现的价值判断更加公允;希望评选活动能更好地起到宣传普及考古学知识,规范发掘方法,推动考古发掘者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锻炼和造就更多的复合型考古人才,推进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同时能够引发更多的对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引来对考古学、对文物保护的更多的援助之手,为考古和文物工作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此,评选活动办公室和三联书店携手,计划每年编辑一本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兼顾学术性、普及性而且图文并茂的图书,奉献给对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我们让做出这些重大发现的考古队长或考古人用他们的笔,用他们手中的镜头,用他们的现场感受,引领我们这些局外的人去经历发现的历程,品味发现的甘苦,思索发现的快乐和精髓。

我们力争使这套图书注重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点：

正确性和权威性。每一发现我们都尽可能让考古队长、发掘现场主持人担当主笔，因为他们是对发现最具有发言权的人。

通俗性和生动性。在策划和约稿中，我们明确要求让那些写惯了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的专家用尽可能生动鲜活的语言来陈述。

形式上的服务性。我们为读者设计了几个不同的阅读线索：发现及其过程；图片及其说明；知识背景与相关链接等等。读者可以任意切入，快入快出，也可以将整个发现和相关知识细嚼慢咽。

每年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作为同时代诸多发现中的佼佼者，肯定会有很多报道和诠释它们的文本——发掘简报、汇报、最终的报告、媒体的报道等等，但是，我们希望本书是最具亲和力的通俗而不失其学术上的正确性和权威性的一个文本，并最终成为能够接受时间考验、流传最广的一个文本。我们希望今后的时代在回顾这个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时，除了一连串的发现之外，与发现相随的诸多思考、努力、愿望、酸甜苦辣的情感和行动都不致被完全湮没，能够留下任人思索和品评的痕迹，能够像考古的发现

以及考古学提供的知识一样，构成另外一条人类的知识进步之链，使人们能够在与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文物和那些发现对视时，更多地享受发现的乐趣，感受古代文明的心音，使自己的心智得到滋润，使现代文明变得更加强健。

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于2001年7月26日在中国文物报社举行，出席的评委有：宿白、徐苹芳、俞伟超、严文明、张忠培、刘庆柱、黄景略、邹衡、李伯谦、徐光冀、张森水、张长寿、叶学明、孙机等著名考古学家及时任中国文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文儒先生，他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了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时代城址、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湖北潜江龙湾宫殿遗址、四川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迹、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为2000年度全国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现在，让我们慢慢地掀开书页，品味这跨越万年的发现的盛宴。

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 曹兵武

2003年3月